

#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慰安妇”形象研究<sup>\*</sup>

韩晓<sup>\*\*</sup>

## <目 录>

1. 绪言
2. 中日韩三国的“慰安妇”形象
  - 1)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慰安妇”
  - 2) 反战视角下的日本“慰安妇”
  - 3) 人道主义视角下的韩国“慰安妇”
3. 看待三国“慰安妇”的视角差异及原因探析
4. 结语

## 1. 绪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本土等地通过各种手段强征了数十万名女性，将她们作为“慰安妇”派遣至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使她们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其中，很多女性丧命于日军的蹂躏之下，有些虽侥幸生存下来，但也饱受身心双重创伤。而由于各种原因，有关“慰安妇”的相关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幸存“慰安妇”开始发声，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当时，“慰安妇”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报道资料或文学作品中。笔者在搜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时，发现当时既有日军在中国各地设置“慰安所”的事实记录，也有将“慰安妇”形象化的文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不仅关

<sup>\*</sup> 本论文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sup> 韩晓，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韩国语专业教师；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中国语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注中国本国女性的受难，还关注韩国、日本女性的遭遇，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反抗意识、人道主义关怀与国际主义精神。这些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我们今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与资料支撑。

目前，学界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文学领域，相关研究则出现较晚，研究成果也还不够丰富。在相关研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振的《抗战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sup>1)</sup>，该文在抗战文学的框架内，首次对“慰安妇”题材作品进行了整理与分析，涉及的作品有《我在霞村的时候》、《梅子姑娘》、《朝鲜少女吟》等，并对作品内容、作家的思想倾向等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中国作家塑造的“慰安妇”形象或体现了明显的启蒙姿态，或在表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体现了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王学振的另一篇论文《“慰安妇”文学：血泪的见证》<sup>2)</sup>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慰安妇”相关作品进行了概述，认为该题材的作品对历史真相做了形象的演绎，是“慰安妇”血泪史的文学见证。其次，韩晓与牛林杰的《有关韩国“慰安妇”题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考》<sup>3)</sup>一文则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在华的韩国“慰安妇”，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分析，认为战争当时发表的作品主要侧重于体现韩国“慰安妇”的受难状况，进而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的同时，起到唤醒中国民众起来斗争的作用；集中出现在战争结束后的作品则主要刻画了战后短暂滞留在上海的原“慰安妇”女性的形象，体现出对她们的同情之意。此外，李存光、金宰旭的《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韩国“慰安妇”形象》<sup>4)</sup>以《血的短曲之八》、《花子的哀怨》及《朝鲜少女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韩国“慰安妇”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强调了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

除上述整体性论述之外，学界也有一些对“慰安妇”题材作品的个案分析，其中讨论最多的当属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学界对该作品既有从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出发做出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sup>5)</sup>，也有从“慰安妇”问题对该作品中体现

1) 王学振,《抗战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4期,2012.12.

2) 王学振,《“慰安妇”文学：血泪的见证》,《中国社会科学报》第864期,2015.12.11.

3) 한사오, 뉴린제,〈한국인 “위안부” 제재 중국 현대문학 작품에 대한 고찰〉,《아시아문화연구》42집, 아시아문화연구소, 2016.

4) 李存光,金宰旭,《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韩国“慰安妇”形象—舒群、碧野的小说和王季思的叙事诗》,《当代韩国》2018年第4期.

的性别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sup>6)</sup>。而对“慰安妇”题材的其他相关作品的个案分析则相对较少。

通过上述整理可以看出，学界已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并梳理了“慰安妇”题材的相关作品，论证了该题材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不过，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与“慰安妇”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因而本文在以往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了相关作品，不仅发现了如《慰安所—湖州城里》、《慰安所》等几篇作品，对学界论述较少的《第三百零三个》、《受辱者》等作品也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引用当时报刊、杂志上发表的通讯等一手材料加以旁证，力图使本文的分析更全面、深入。其次，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中塑造的“慰安妇”形象，除了本国女性之外，还有来自韩国、日本的异国女性。而目前学界的研究要么将其放在“慰安妇”题材的整体框架下进行论述，要么只以其中一国“慰安妇”为主题展开分析，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出不同国籍的“慰安妇”形象背后体现的作家意识。而我们深知，“慰安妇”这一题材不仅是一个关乎当时乃至当今东亚各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性问题，也是一个与性别、民族、权力密切相关的议题，它背后体现了殖民对被（半）殖民、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的暴力。因而，本文力图以翔实的文本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等多种理论与方法对不同国籍的“慰安妇”形象进行分析，一方面通过再现当时各国“慰安妇”的生存面貌，揭露侵略战争的暴力性及残酷性，另一方面也试图探析隐藏于民族主义机制下的性别、父权制度等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从多个维度对该问题做出探讨。

5)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传霞，《论中国底层妇女的主体性与救赎之路——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姊妹行〉为样本》，《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朱秀清，《徘徊在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

6)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吴晓佳，《“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이선이, 〈중일전쟁시기 덩링(丁玲)의 일본군 성폭력제현과 1956년 전범재판 그리고 피해자 증언의 의미〉, 《중국학보》 80집, 2017.

## 2. 中日韩三国的“慰安妇”形象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首先对本文使用的称呼进行说明。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慰安妇”题材的相关作品，可以发现对该群体有“营妓”、“军妓”、“日军的妓女”或“随军营妓”等各种称呼。这些称呼代表了当时社会对该群体女性的认知，有将“慰安妇”受害女性等同于“妓女”之嫌，从而可能无法体现日军“慰安妇”政策的强制性，也遮蔽了隐藏在这背后的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暴力，因而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在行文中，一般情况下按照目前学界使用的加双引号以示否定的方式来加以称呼，而在引文中则使用原文的标记方式。

目前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以“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既有小说、旧体诗歌等传统体裁，也有报告文学、歌剧文本等较为现代的文学体裁。其中既有以中国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也有将日本、韩国的“慰安妇”形象化的作品，并且作者们在塑造不同国籍的“慰安妇”形象时，投射了不同的视角，因而本文首先将挖掘出的“慰安妇”形象按照国籍进行分类，然后再对作家看待不同国籍的“慰安妇”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探明其背后隐藏的不同的作家意识。

### 1)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慰安妇”

中国现代文学中塑造的中国“慰安妇”，既有像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塑造的被人熟知的“贞贞”的形象，也有诸如《受辱者》、《慰安所》中塑造的目前研究中鲜有提及的女性形象。相关作品整理如下：

1.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6.
2. 草明,《受辱者》,《中苏文化》卷六,第六期,1940.
3. 柳青,《被侮辱了的女人》,《解放日报》,1941.9.2.-3.<sup>7)</sup>
4. 王澧泉,《慰安所》(独幕剧),《抗战周刊》第38期,1940.
5. 冯玉祥,《南京一少女》,1938.9.19.<sup>8)</sup>

7) 该小说原载于《解放日报》，本文使用的文本出自武汉师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参考资料》，1977，第89-98页。

除上述整理的作品之外，还有《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sup>9)</sup>与《南京慰安所里》<sup>10)</sup>两篇通讯，分别记录了鬼子胁迫联保主任强征女性供日军奸淫和日军对慰安所女性的虐待等内容。它们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日军残害女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与文学文本呼应，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残酷本质。

本部分先来分析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该小说塑造了“贞贞”这位被日军掳走的“慰安妇”<sup>11)</sup>形象。小说先是用近一半的篇幅叙述了霞村各色人等对贞贞的态度和看法，这种安排看似无意，实则是在为后文贞贞的出场做出铺垫，同时也展现出偏僻村庄封闭愚昧的文化氛围，从而揭示了贞贞遭受苦难的多重性。

首先，从民族压迫的框架中来看待贞贞的遭遇时，贞贞在天主教堂偶然遭遇日军并被掳走，从而落入火坑，成为日军蹂躏的对象。这说明贞贞受到了来自于日军所代表的军国主义的暴力，是当时众多女性受害者中的一个。这样的经历不仅对贞贞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她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也使她因为“失贞”而成为村里人冷嘲热讽的对象。其次，环绕在贞贞周围的封建男权思想也是我们解读本文时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她被掳走做“慰安妇”之前，村里的人就认为“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看见她早前就在这街上浪来浪去”<sup>12)</sup>，这样的评价仿佛贞贞天生就是异类，活该被掠去遭难。因而当贞贞从慰安所回来后，人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嘲笑她，所谓“这种缺德的婆娘”，“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sup>13)</sup>等等，这一系列无论是村里男性站在男权视角下对“不贞”的贞贞的贬低，还是女性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不洁”的贞贞的鄙视，都构成了对她的再次伤害。身心的创伤与周边环境的压抑，使贞贞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决定听从安排去新的地方。“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sup>14)</sup>这样的选择可以看作是其作为一个独立

8) 本文使用的文本出自1995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抗战诗史》。

9) 梅兰，《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群众》第1卷第12期，1938.3.5。

10) 任重，《南京慰安所里》，《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

11) 学界相关研究认为“慰安妇”有长期与短期之分。参见：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26页。这说明可能除了本文整理的作品外，还存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文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补充完善。

12)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6，第26页。

13) 同上注，第26页、30页。

的个体与过去及霞村所代表的传统的决裂，这不仅是贞贞，也是作家为其做出的光明选择，从而使贞贞获得了革命的主体身份。

同为女性作家创作的《受辱者》没有像《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样受到广泛关注，相关论述也较少。该小说的背景是日军占领后的顺德桂洲乡，该乡剿丝厂女工梁阿开被日军掳走后编入了“妇女劳军第五小队”，并在那里遭受了五天五夜的蹂躏。像阿开这样的女性属于短期“慰安妇”，她虽然侥幸活命，但被释放后还能回归日常生活吗？从阿开复杂的心理活动中，我们便可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这时候她有力气，她会忍耐不住，把自己所忍受的耻辱和心中燃烧着的愤怒，从头到尾对大家说了出来。……她又忧愁地想着：如果我把日本人对付我的龌龊情形告诉了她们，那么，以后我还能在别人跟前讲一句响亮的话吗？”<sup>15)</sup>正如霞村人对贞贞的蔑视与嘲笑一样，桂洲乡也不是接纳阿开的幸福乡。传统的父权社会制度设定了妇女的贞操美德，阿开明明是受害者，却不能进行控诉与抗争，也不会获得周围人的同情，甚至还遭到了熟知她在慰劳队经历的地痞的讹诈，焦虑及创伤使她患上了肺结核，也使她更加痛恨日本人，这也成为后来阿开走向觉醒的契机。

与贞贞利用身份之便负责传递情报，从而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并最终获得了归属感不一样的是，阿开是在遭受了日军的蹂躏后自发走向了觉醒的道路。当工厂被日本人强征用于制造兵器后，既失去了工作希望，又身患严重肺结核的阿开，最终将心底对日本人的仇恨付诸实践。她潜入工厂，用硝酸毁掉了将要为敌人制造兵器的设备。她的反抗符合当时左翼文学中的“压迫—觉醒—反抗”的一般模式，而在这里，民族压迫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阿开身份的特殊性，也使她的反抗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柳青的《被侮辱了的女人》则展现了女性遭遇日军性暴力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结婚多年未孕的赵宽嫂被日军侮辱后怀了孕。日军的性暴力不仅使赵宽嫂失去了“贞洁”，孩子的存在还象征着赵家血统被玷污。赵宽嫂对此感到羞愤、难堪，认为“这个孩子是她被侮辱的标记，将来被旁人当做笑柄终生嘲弄她”<sup>16)</sup>，她的丈

14) 同上注，第31页。

15) 草明，《受辱者》，《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第6卷第6期，第57页。

夫更是恨不得弄死这个孩子。当几次寻死不成的赵宽嫂被日本人再次抓走去“慰劳”后，她不仅杀死了那个象征着耻辱的孩子，自己也成了疯子。赵宽嫂的悲剧从另外一个层面展现了被侮辱之后的女性的无助与惨痛的经历，进一步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对中国女性造成的巨大伤害。

冯玉祥的《南京一少女》中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少女的形象。该诗先是用“南京一少女，被敌捆掳去。迫令为营妓，拼死力抗拒。关入禁闭室，终朝不得食”几句叙述了少女被日军掳走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的气节，然后又用“少女得菜刀，猛砍诸强盗”的诗句表现了少女勇于反抗的精神，最后又用“她是一少女，竟能杀三贼。请君细想想，男儿当何为？”<sup>17)</sup>的反问语气强调男儿应奋起御敌，以期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该诗歌创作于1938年9月，即日军占领南京几个月后，这样的创作背景一方面在于弘扬身为女儿身却能舍身成仁的少女的英雄气节，另一方面也通过同族女性被欺凌来激励男儿们奋勇杀敌。不过，这首诗歌虽然高度赞扬了该女子的气节，但用“贞烈”来称赞该女子的行为，不免又隐约流露出男权思想的潜意识。

王澧泉的《慰安所》是根据当时广为流传的日军与“慰安妇”妻子在慰安所相遇的故事改编的独幕剧，该故事及相关的文学作品创作将在后文日本“慰安妇”部分详细论述，本部分只探讨作品中出现的中国少女形象。文中的中国少女父母皆被日兵杀害，少女因不愿意嫁给表哥，而被当了慰安所管理员的表哥骗入慰安所，不仅遭受日军的性暴力，还动辄遭到表哥的拳打脚踢。但尽管遭受了这样的暴力，少女对身处同一个慰安所的日本女性慧子还是表现出了同情之心，显示出她善良的本性，也引起人们对她遭遇的更深刻的同情。少女的遭遇说明来自同族男性的暴力也是造成女性受难的一个原因，说明性别因素在压迫女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6) 武汉师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同上书，第93页。

17) 冯玉祥，《南京一少女》，出自陈汉平，《抗战诗史》，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7，第243页。



## 2) 反战视角下的日本“慰安妇”

战时日军在本国也组织或强征了不少女性，将她们以“圣战”之名派往中国各地。不仅当时一些媒体关注到这一现象，而且这些女性也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相关作品整理如下：

1. 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6.18.
2. 布德,《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战线》副刊,1938.8.23.-24.<sup>18)</sup>
3. 林心平,《第三百零三个》,《抗敌戏剧》,1938年第7/8期.
4. 小峰,《慰安所里一湖州城》,《巨轮》,1939年第1卷第3期.
5. 王禮泉,《慰安所》,《抗战周刊》,1940年第38期.
6. 谢冰莹,《梅子姑娘》,《梅子姑娘》(小说集),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
7. 冷波,《梅子姑娘》(五幕剧),《黄河(西安)》,1941/42.
8. 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作词,《秋子》(歌剧),1942.

从时间上来看,最早发表的以日本“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是《扬州的日兵在自杀》。该作品取材于真实事件,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兵宫本一郎与妻子秋子意外相逢于扬州慰安所并羞愤自杀的故事。

在该文中,作者着力塑造的虽不是“慰安妇”秋子的苦难,但从秋子被强征到走向自杀的结局,都体现了日本军阀的残酷本质。尤其,宫本遗物中的标语“日本军阀牺牲你们的生命,换取他们的权位,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而不是中国!”“支那人民应该和日本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sup>19)</sup>等等,更是将作品的中心思想推向了呼吁日本人反战的高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文坛出现了一系列以该事件为原型的作品,虽然女主人公的名字有慧子或秋子之不同,不同作品中呈现的细节有所差异,但基本都是以日本夫妇慰安所相遇并自杀为原型的,可见当时该类型故事在中国的广泛流布。

例如,《第三百零三个》的故事原型就是《扬州的日兵在自杀》。该小说的背景

18) 同年的《杂志》、《公余》上也刊发了该文章。本文使用的文本出自《杂志》(1938年第2卷第3期)。

19) 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6.18,第109页。



依然是扬州，主人公分别是吉田与慧子。题目中的“第三百零三个”，指的就是吉田来到中国战场后蹂躏过的女性数量，这第三百零三个正是吉田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妻子慧子。

小说的情节比《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更为充实，被征为“慰安妇”的慧子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但战争使她的丈夫被征调入伍，她自己也被日军当做“圣战”的工具被迫向“皇军”献身，就连年幼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于难。此外，小说还描绘了昔日吉田与慧子在东京时的幸福时光，使残暴的日兵也体现出曾经人性的一面，从而控诉了战争扭曲了正常的人性，为后文慧子与吉田的血激发了同伴们的反思打下了基础。“是战争使他的伙伴变成残酷如同魔鬼，是战争使他的伙伴妻子变成妓女，是战争使他的伙伴的儿子死了！……无数伙伴，无数的同样悲惨的命运呵！谁发动这战争，为什么发动这战争呢？”<sup>20)</sup>寥寥数语便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目的，即通过战争给日本普通民众造成的苦难来控诉战争的不合理性，从而起到瓦解、分化日军，并进而宣传反战的目的。这无疑是作家借着文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心声，但也使小说看起来像是一段宣言，因而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就有研究者指出“每一个作者都应该有他底明确的立场，和从他底创作中表达他底政治思想，然而，这表达，必须融化在作品里，必须不要忘记创作是一种艺术……太切于呼号，切于向着光明！布德先生底重要的缺失，大体也就在于此。”<sup>21)</sup>

虽然该小说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救亡的紧迫性使其受到了当时文坛较为广泛的关注。例如刊载该小说的《大公报》上就有社评指出“日本军阀是安心驱策它的同胞来中国送死的，这群被残忍牺牲的可怜虫，到中国也便发挥他们烧杀淫掠的残忍性。日本军阀征发壮男到海外送死，同时更征发少女到中国‘慰劳’，这对于战士，对于出征军人家属不太残酷了吗？但在奴性日本之贱视妇女，是做得出来的！”<sup>22)</sup>通过对文本深刻的剖析揭露了日本军阀的本质。同年，还有林心平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独幕剧被创作出来，体现了布德小说产生的影响。

此外，前面分析过的王澧泉的独幕剧《慰安所》的故事原型也是日本夫妻在慰

20) 布德，《第三百零三个》，《杂志》，1938年第2卷第3期，第27页。

21) 廉岸，《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第八版，1940.4.28.

22) 王芸生，《读〈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社评，1938.8.24.

安所相逢的事件。不同的是该剧本中增加了中国人的形象，通过被表哥卖进慰安所的中国少女与日本“慰安妇”慧子的对话展开整个故事情节。并通过两位女性惺惺相惜的交流，更进一步地揭露了女子受难的本质以及对“慰安妇”制度的控诉。歌剧《秋子》也是以《扬州的日兵在自杀》为原型改编的。该歌剧以秋子的经历贯穿始终，并插入了“我军”安排人员潜入日军以及“我军”夺回扬州等内容，除表达了呼吁日兵反战的主题之外，更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另外，上述所有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几乎都选择了自杀，而歌剧中的秋子与宫毅则被中国军队解救，从而获得了新生。歌剧通过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的对比，进一步强调了抗战的正义性和不义的侵略战争必然失败的事实。

《慰安所里—湖州城》也属于该类型的小说。不同的是，该小说里出现的两名日军都在慰安所里碰到了自己的妻子并双双选择自杀，而对身为“慰安妇”的妻子的描写及结局则语焉不详。题为《南京慰安所里》的报道中甚至还出现了丈夫与妻子、妹妹同时相逢的记录。这些记录或描述多少带有一些戏剧性与偶然性，但作者们都是旨在通过这种极端反人伦的事件，来揭露日本军阀的野蛮本质，并为呼吁有良知的日本人反战做铺垫。

上述一系列以夫妻相逢为主题的作品，虽然都是基于明确的反战意识被创作出来的，但主人公的反战意识基本还处于萌芽阶段，并没有真正走向反战的道路。而谢冰莹的《梅子姑娘》中的主人公梅子则将反战付诸了实践，并最终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梅子出身贫困，父亲在“九·一八”事变后应征入伍，丧身战场，母亲也因肺病离开人世。小说前半部分着力铺垫了梅子被征入慰安所之前遭受的苦难，目的是为后文她成为“慰安妇”后对战争产生反思做出铺垫。梅子身上可谓集中体现了女性所能遭遇的各种悲剧，这使她形成了一定的性别自觉，所以在慰安所里讨论化妆问题时，梅子认为“为什么一个女人非给男人玩弄不可呢？如果擦粉涂胭脂是为了天性的爱美，我并不反对；若是仅仅为了使男人高兴，我觉得这种化妆，简直给女人们一个莫大的侮辱”。<sup>23)</sup>而来到中国后的经历，使梅子的反

23) 谢冰莹,《梅子姑娘》,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短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49页。

战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不仅她自己遭受了身体的虐待，她还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罪行。

梅子在汉口整整地住了半年，她记不清曾经被多少喝醉酒的“皇军”摧残过，由那些醉鬼的嘴里，知道他们在中国的前线是如何残忍地强奸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和十来岁的小姑娘。在这半年中间，梅子的思想上起了一个剧大的变化！她知道“皇军”是怎样地任意强奸中国的妇女，活埋中国的壮丁，屠杀中国的老人和孩子，焚烧中国人的房屋，抢夺中国人的财产。只要你是人，绝不能饶恕他们这种违背天理，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sup>24)</sup>

这样的经历，使梅子看透了日本军阀的本质。“梅子恨透了，为什么地球上要有一个日本，而日本又产生这么多兽性的军阀，自己又为什么偏偏生在日本而且赶上他们屠杀中国人的时代？”<sup>25)</sup>所以梅子乐于接触有反战意识的日军，并与航空兵中条产生了爱情，于是他们一起策划逃离了日军，来到了中国军队，并最终被安排在朝鲜义勇军中参与对日作战，几经考验，真正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如果说上述一系列以夫妻相逢为主题的作品最终基本（除歌剧《秋子》外）都以悲剧结尾，主要在于揭露日本军阀的本质的话，那么《梅子姑娘》中的反战日本人则走到了与中国人民以及在中国的抗日朝鲜人的队伍中，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份力量，而且爱情也在反战实践中得到了升华。这样的情节设置可以说是在呼吁反战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真正贯彻了当时流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也为“慰安妇”女性的解放之路做出了一定的探讨。

不过，即便是女性作家谢冰莹的作品，虽然也描写了梅子在沦为“慰安妇”之前的各种惨痛经历，对女性遭遇的暴力进行了详细的刻画，但在对作为“慰安妇”时梅子所遭遇的苦难的刻画上却显不足，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梅子与中条从谈论反战到实际将反战付诸实践的过程上，可以说宣传反战、呼吁自由和平才是该作品的最终之意，所以作品中也不乏标语性的语言。例如，梅子认为“中国是个真正爱

24) 谢冰莹，《梅子姑娘》，同上书，第654页。

25) 谢冰莹，《梅子姑娘》，同上书，第654页。

好和平的国家，他们不像日本军阀的生性残忍，喜欢杀人，他们自中日战事开始，就俘虏了我们不少的弟兄，从来不伤害一个，而且特别优待他们。”<sup>26)</sup>对于自来到中国就一直待在慰安所里的梅子来说，实际接触中国军队并了解战俘政策的可能性应该不高，可见这是作家借梅子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这样的认知在改编自《梅子姑娘》的五幕剧中也有明显体现。梅子在劝告中条投诚时强调“希望我们能为了正义而死，也不愿意这样忍辱地生活下去”，她还希望中条“多说服一些空军同志，大家把炸弹向日本军阀的头上扔去，主要是轰炸那些重要的阵地和军事政治的重要机关”<sup>27)</sup>，从而更明确地表达了个人理想与实施反战的途径。可见，梅子被作者赋予了言说自我的功能，是作者通过梅子之口表达了自己乃至当时社会的反战意识。

另外，剧本《梅子姑娘》还在开头用较长的篇幅揭露了日军“营妓”制度的欺骗性质。同时，作者还用反人伦的“营妓”制度引出了有良知的日本青年的觉醒，他认为“营妓”也是大和民族的人种，可是他们却做了日本军阀的脚下的牺牲品，这种尖苛的压榨，稍微有一点感觉的日本青年，便马上会感到生活的渺茫，懦弱一点的不免由彷徨，错乱而走向自杀。比较积极地他会本着他固有的人性而起来反抗，因为他要在那混沌的暗夜里寻求光明。”<sup>28)</sup>这样的铺垫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作品中人物反战意识的由来。另外，剧本中还详细地描写了慰安所中各色日本女性的形象，尤其是美田子与娟枝子等甘愿为“皇军”卖命甚至告发梅子的行为与反战的梅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娟枝子在梅子逃跑后被囚禁的过程中也终于认清了日本军阀的可恶，可见梅子的行为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也说明呼吁反战在日本人中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 3) 人道主义视角下的韩国“慰安妇”

以韩国“慰安妇”为对象的作品在韩晓、牛林杰的《有关“慰安妇”题材的中国现

26) 谢冰莹，《梅子姑娘》，同上书，第660页。

27) 冷波，《梅子姑娘》第三幕，《黄河（西安）》，1942年第2卷第11/12期，第989页。

28) 冷波，《梅子姑娘》第一幕，《黄河（西安）》，1941年第2卷第9期，第851页。

代文学作品考》以及李存光、金宰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慰安妇”》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挖掘，本部分结合先行研究的成果，将相关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 舒群,《血的短曲之八》,《中学生》第3号,1939.6.
2. 碧野,《花子的哀怨——一个女俘虏的遭遇》,《大公报》,1939.10.27.
3. 王季思,《朝鲜少女吟》,《越风》,1940.9.
4. 潘世征,《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群可怜虫》,《战怒江》,1945.3.
5. 蓝云,《韩国“营妓”访问记》,《女声》第4卷第2号,1945.3.
6. 郑燕,《高丽姑娘》,《上海的秘密》,1946.1.
7. 虎痴,《营妓》,《万象》第3号,1946.4.30.
8. 大狂,《营妓》,《风光》第9号,1946.5.6.<sup>29)</sup>

首先,从创作时间来看,以韩国“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不仅出现在抗战当时,也较为密集地出现在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这是与中国、日本“慰安妇”题材的作品的一个不同之处。其次,以韩国“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数量虽然整体上与日本“慰安妇”相当,但基本没有同一的故事原型,几乎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存在着大量的韩国“慰安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作家与她们可能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所以才使这些韩国女性被刻画的有血有肉,而不是出现千人一面的情况。

中国作家在看待韩国“慰安妇”时,多投以同情的视线,通过对她们悲惨身世和遭遇的真实揭露,表达了对她们深刻的同情并给予热忱的人道主义关怀,还通过将中国军队的人性与日本军队的残暴进行对比,从而一方面以“他者”之镜警醒中国民众奋起抗战,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作品立足于弱小民族的连带意识表达了联合抗日的意图。另外,以韩国“慰安妇”为主题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慰安妇”在日军蹂躏下所遭受的苦难,揭露了民族压迫的实质,批判了侵略战争及日本帝

29) 本目录是在한샤오, 뉴린제,〈한국인 “위안부” 제재 중국 현대문학 작품에 대한 고찰〉(《아시아문화연구》42집, 179-206쪽, 2016. 相关文献的整理参见第181页。)与李存光、金宰旭的《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韩国“慰安妇”形象——舒群、碧野的小说和王季思的叙事诗》(《当代韩国》, 2018年第4期, 64-77页)中发掘的文本上进行的筛选与整理。

国主义的野蛮本性。在这些作品中，韩国“慰安妇”通常被描写成弱小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女性出身于殖民地，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而中国作家乐于用同情的视线看待她们，并通过对她们悲惨身世或在慰安所凄惨经历的揭露，引起读者对她们的遭遇产生深刻的共鸣，并进一步唤起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再者，不少以韩国“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了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与韩国女性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关联。如《血的短曲之八》中的“她”甚至是在“我”的帮助下才决心走上反抗的道路，而《花子的哀怨》中的“花子”则是与中国人“我”相遇并向“我”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潘世征的报告文学则更是以作者本人对“慰安妇”的直接采访为基本内容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与以日本“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之间存在的一个鲜明的不同之处。以日本“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篇作品中出现了中国人形象。中国人形象的缺失也说明日本“慰安妇”形象的主要来源不是作者的直接或间接体验，而主要是想象的产物，这也是造成日本“慰安妇”形象较为单薄、单一的原因。

首先来分析舒群的《血的短曲之八》与碧野的《花子的哀怨》两篇小说。这两篇作品都写作于抗战当时，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被迫来到日本军营任人蹂躏的朝鲜贫困女性，两位作家都对作品中的女性表达了无比同情之意。《血的短曲之八》中的她“很幼小，最多不过十六七岁。她的身体，很瘦弱，瘦弱得使人感觉她的生命难有纪念的长久；好像初春的嫩苗，被暴风雨摧残过，在世界上难有长久的勾留了。”<sup>30)</sup>作者用“初春的嫩苗”比喻幼小的“她”，用饱含同情的视线深刻地展现出受压迫的韩国女性的悲惨遭遇。尤其是年纪幼小、身体瘦弱的人物形象，更说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惨无人道，在引发读者对于“她”的身世的深刻同情之外，也更容易唤醒读者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从而使中国读者以此为镜鉴做出思考，进一步明确抗战到底的决心。《花子的哀怨》中的主人公花子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失明，大哥早年因独立运动被杀，二哥葬身海上风暴，三哥被征兵后死于中国，花子自己被卖到日本，后又被强征为“慰安妇”，好不容易获救，刚刚有了生存下去

30) 舒群，《血的短曲之八》，出自金柄珉、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第1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第397页。



的希望，不料又遭到日军轰炸而失去了性命。她的遭遇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殖民地出身的朝鲜女性的典型代表，也更容易引起“我”对她产生人道主义的关怀。尤其，花子刚刚获得自由却又失去了生命，这样的结局使她的“哀怨”无法得到释放与言说，也正是这样悲剧的结局，才更深刻地揭露了战争对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控诉了战争的罪恶。

不过，《血的短曲之八》的故事重点在于通过展现“我”对“她”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她”重新获得了生的希望，并决定加入“我们”的队伍，进而表达了中韩两国联合抗日的意识。而《花子的哀怨》更加侧重的是通过表现花子的悲剧，体现出“我”将她作为平等的人加以对待的人道主义精神，并通过她的悲剧，批判了军国主义的暴力。

在以战后滞留上海，沦为妓女的前“慰安妇”顺子为主人公的作品《高丽姑娘》中，作者也对顺子投去了同情的视线。该作品讲述了16岁就被拐骗到中国当“慰安妇”后又沦为妓女的顺子的遭遇。顺子与“她”和花子一样，都是被强征或诱骗至中国的韩国下层女性。她们被迫远离故土，受尽日军的戕害，但都思念与眷恋着祖国，这种情感体现出她们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正是在异乡遭受的来自于日军的暴力，使她们明确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她们有的通过对故乡的回忆安慰自己饱受创伤的身心，有的则通过思乡唤起对侵略者的仇恨，以激励自己走向反抗的道路。例如，《血的短曲之八》中的“她”“仿佛更记起了而且渴望着她的祖国、故乡、家庭，人类圣洁的感情依托的所在”<sup>31)</sup>。这样的乡愁使她更加仇恨侵占自己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使她能够坚定为实现所有的朝鲜人都回国而加入“我们”一起斗争的决心。花子虽然没有直接地表达过思乡之情，但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陪她一起去看看汉江和釜山湾。而顺子的思乡之情则是通过她讲述自己身世时，对故乡满含深情的回忆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思念不仅是韩国“慰安妇”民族身份的体现，同时也是作者通过对她们民族身份的再确认，进一步体现出她们的悲剧也是民族悲剧的缩影，从而凸显了“敌-我”之间的对立，进而才能借“他者”之镜像警示自我。这是与日本“慰安妇”题材的作品的另一个鲜明的不同之处。在对日

31) 舒群，《血的短曲之八》，出自金柄珉、李存光，同上书，第399页。



本“慰安妇”的描写上，则主要通过她们被强征或欺骗来到中国战场“慰安”的经历，将一般百姓与日本军阀区分开来，说明日本下层民众也与中国民众一样处于受剥削压迫的地位，从而起到一起反对日本军阀、反对战争的目的。

除上述作品中塑造的个体形象之外，长篇叙事诗《朝鲜少女吟》及报告文学《敌随军营妓调查》展现的则是受难的韩国“慰安妇”的群像。其中，《朝鲜少女吟》的作者王季思以中国军队在新乡战斗中拯救的两名朝鲜少女为原型，用饱含同情与关切的笔致刻画了受难的韩国女性的形象。无论是被抛尸深谷的东家阿妹，还是“皮骨虽存神已死”的崔家阿姐，她们都是受压迫的韩国女性命运的缩影，也体现了国破家亡之下，殖民地民众完全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并通过“欲知亡国无穷恨，请听朝鲜少女吟”<sup>32)</sup>的诗句警醒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而潘世征的《敌随军营妓调查》则是以在腾冲被中国军队俘获的韩国“慰安妇”的调查为基础创作的报告文学，文中详细记录了腾冲前线的日军慰安所的分布状况，以及日军在败亡之前对“慰安妇”的虐杀，同时还记录了这些被俘虏的韩国女性沦为“慰安妇”的经历。他的记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这些女性如何来到中国的相关记录中，提到了有的是因为被丈夫所遗弃，有的则是死了丈夫，还有的则是被衣食无着的父母卖掉，然后再被替日军招募女性的相关人员带到前线来蹂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些女性的受难不仅是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产物，家长制度、男权主义及性别歧视也是造成她们苦难的因素。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些女性的命运与前途所做的思考。作者指出部分女性因为能维持生活所需而被敌人麻醉，直到她们的同胞被残害才有所警醒。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因为她们从敌人的魔爪下被解救出来就认为她们有了光明的前途，反而更深刻地思考了抗战胜利后女性的出路问题，从而体现了更深层次的人道主义关怀。

对韩国“慰安妇”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同情，依然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相关作品中的主要思想。无论是“而今湖海飘零客，尽是萱韩梦里人”<sup>33)</sup>，还是“此日有家归不得，料应同悔祸噬脐”<sup>34)</sup>的诗句，都表达了对当时滞留在中国的韩国女性的同

32) 王季思，《朝鲜少女吟》，出自金柄珉、李存光，同上书第5卷，第92页。

33) 虎痴，《营妓》，《万象》第3号，1946.4.30.

34) 大狂，《营妓》，《风光》第9号，1946.5.6.

情之意。而《韩国“营妓”访问记》、《大批营妓集中》两篇作品都是以当时滞留在上海的“慰安妇”的生存状况为主题的纪实作品，其中前者记录详实，后者较为简略，且与前者在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中，《韩国“营妓”访问记》详细记录了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的韩国有识之士对曾经的“慰安妇”女性展开的救助活动，尽管她们的生活因为收容所经费的不足而不够宽裕，但她们都表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期待与渴望。作者在真实再现了战后“慰安妇”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呼吁人们不要用歧视的眼光看待这些苦难的女性，进一步表达了人道主义关怀。

除上述作品外，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些作品间或提及了在华的韩国“慰安妇”的状况。例如，谢冰莹在小说《一个韩国的女战士》中就提到了韩国“慰安妇”的状况。“女俘虏里面，常常会遇到韩国的姊妹，她们都是被日本人压迫来当营妓的，过的是惨无人道的生活，真是可恨极了！”<sup>35)</sup>一方面通过寥寥数语呈现了韩国女性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作为“敌人”的日本与作为“我们”的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对立，从而明确了联合抗日的意义与价值。

### 3. 看待三国“慰安妇”的视角差异及原因探析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塑造了中、日、韩三国不同的“慰安妇”形象，作者在看待这些不同国籍的“慰安妇”时，投射了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的差异，可能源于作者本身的个体差异，但在描写同属某一国籍的“慰安妇”形象时，不同作者又表现出一定的共性，这说明当时人们对某一国家的“慰安妇”带有较为相似的认知与想象，也说明这些形象受到了当时社会集体意识和集体想象的影响，带有集体想象物的特征，从而可能使某一国的“慰安妇”形象呈现类型化的特点。

具体说来，以中国“慰安妇”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相对来说虽然数量不多，但作

35) 谢冰莹,《一个韩国的女战士》,出自金柄珉、李存光,同上书第1卷,2014,第411页。

者们在塑造这类形象时，倾注了较为多元复杂的视角。首先，中国作家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框架，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揭露了民族压迫的实质。这是因为在抗战的宏大背景下，中国首先面临的就是民族解放的问题，而同族女性的被残害则是最容易引发民众反抗的因素。同时，受戕害的女性因为本身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与压迫，才更容易走上反抗的道路。无论是决定离开故乡去开始新生活的贞贞，还是毁坏被日本强征去制作兵器的工厂设施的阿开，又或者是以一己之力杀掉日寇并含笑自尽的南京少女，她们都可以说是代表了战时受难的中国女性的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决心与力量。其次，在深刻揭露民族压迫的同时，中国作家还注意到了造成女性受难的父权（或男权）思想的压迫。无论是生活在偏僻山村里的贞贞，还是生活在较为开化的南方的女工梁阿开，以及被表哥骗入慰安所的少女，她们都因身为女性受到了性别歧视。贞贞受到村里人嘲笑，梁阿开受传统贞节观念的影响不敢揭露日军的罪恶，少女被表哥卖入慰安所，这都说明在同一个民族内部，男女也有序列的差异，性别不平等也是造成“慰安妇”女性身心创伤的一个因素。

而在刻画与描写日本“慰安妇”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更多侧重的是通过日本军阀对同族女性的性压迫，揭露帝国主义野蛮与暴力的本质，从而起到呼吁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一起反对侵略战争的目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193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就呼吁“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中略），同样的要联合在日本国内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人，农民，兵士，知识界等，以便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sup>36)</sup>，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从这样的脉络中来理解当时出现的基于反战视角描写的日本“慰安妇”的相关作品，可以发现不仅这些作品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同时作品中体现的反战意识也存在广泛的现实基础。

从这一立场上来看，来自于韩国的受难女性自然也是中国革命团结的对象。尤其中韩两国之间基于共同的反帝反殖民立场，形成了一定的连带关系与联合抗

36)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红色中华》，1934.9.21.

日的基础，所以当大批韩国“慰安妇”被日军裹挟到中国战场时，中国作家自然带着人道主义的同情视线将她们形象化。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血的短曲之八》中加入“我军”队伍的“她”，还是被“我方”救助的花子或“不信将军赐就医”的朝鲜少女，又或是战后因各种原因继续滞留中国的韩国“慰安妇”，都成为中国作者进行人道主义关怀的对象。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作家在看待来自日本或韩国的“慰安妇”时，就只基于反战或人道主义的视角来将她们形象化，而没有关注“慰安妇”问题中的阶级、性别等因素，只不过是可以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反战或人道主义视角占据了较大比重。在日本“慰安妇”的相关作品中，无论是以秋子（或慧子）为代表的以夫妻相遇为主题的一系列作品，还是谢冰莹笔下的梅子，这些女性其实都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说明即便是在侵略国内部，女性也避免不了受害的命运。此外，还需注意一些日本女性不仅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反而认同日军所谓的“圣战”和“大东亚共荣”的逻辑，甚至甘愿为“圣战”献身，这类女性无疑也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韩国女性自然更不必多说，出身于殖民地的命运，使她们成为殖民链条最底端的属下阶层，她们不仅受到来自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还受到本国（族）男性的压制，这一点可以从有的女性因长相丑陋被丈夫抛弃中得到证实，也可以从有朝鲜人代替日军购买贫穷人家的妇女并将其送到慰劳队的记录中得到印证，这都说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客体地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在看待中日韩三国“慰安妇”时，在基本都流露出同情之意的同时，又基于不同的写作目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思想倾向，体现出不同的视角。

这种差异的形成，首先可能来自作者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虽然都是以“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但不同作家所处的环境，实际接触到的“慰安妇”女性，以及作者本身的认识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丁玲与草明为例，两人都是女性作家，并且都在1930年代加入了左联，她们不仅关注中国“慰安妇”女性身体上遭受的创伤，也关注她们心灵的创伤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环境对女性产生的禁锢与影响，并试图从受难女性觉醒的过程中来探讨女性命运与革命叙事的关联。这两位

作家在刻画“贞贞”与“梁阿开”两位女性形象时，都有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控诉日本恶行的一面，也有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女性主体建构的一面。这样的努力，可以说与作家本身的女性身份有着密切关联，所以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显然渗透着作者对于自己命运的思考。贞贞最终的选择隐喻着丁玲自己的选择，体现出丁玲自身的革命认同。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丁玲在这里写的，虽然是‘贞贞’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她自己的传奇！”<sup>37)</sup>草明亦然，她曾如是回忆自己的创作“我没有钱去上学，又拿不出拜师钱去学剃丝，那只好成天在厂内外转悠、玩耍，听她们随编随唱的怒骂、怨恨、讥诮的动人的木鱼歌调。我喜欢她们，我爱她们豪迈、勇敢与坦荡的风格。我从小就种下了同情工人阶级、爱工人阶级的根子。”<sup>38)</sup>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草明创作了一系列以剃丝女工为主题的作品，《受辱者》也不例外。梁阿开从受辱到觉醒再到将反抗付诸实践的过程，与草明其他以产业工人为原型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是草明本身民族认同、阶级意识的投射。再如，属于东北作家群的舒群除了《血的短曲之八》之外，还创作了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与《海的彼岸》等作品，这说明他一贯关注流亡到中国的韩国人的遭遇。另外，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舒群被迫离开故乡，《血的短曲之八》中韩国少女“她”对祖国的回望，隐隐折射出作者本身对于被占领的故乡的眷恋。而对于谢冰莹而言，她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也在抗战期间上过前线，可以说是一位在亲身的革命实践中探索女性意识的作家。所以她笔下的梅子也富有独立意识，不仅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还追求灵肉一致的爱情。诚如贞贞最后前往延安既是贞贞，也是丁玲自身选择的投射，梅子的爱情观与价值观也是谢冰莹自我思想的体现。

其次，不同的创作目的，导致中国作家看待同是异族女性的日本与韩国“慰安妇”时的视角也有所不同。其实，不仅是看待她们的视角有所差异，从塑造的女性形象与创作的时间也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对韩国“慰安妇”的关注时间长，作品中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不仅描绘了她们的群像，也塑造了一个个较为鲜明的个

37) 李杨，《“右”与“左”的辩证：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第6页。

38) 草明，《草明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第5页。

体形象，对她们如何来到中国，遭受了怎样的创伤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且很多形象都来源于作者的见闻，所以这些形象通常比较立体真实，她们之间既存在共性，也体现出各自的个性。出身于殖民地的韩国女性的受难，折射出中国作家呼吁救亡的紧迫感。纵观当时的中国，山河破碎，还有很多民众精神愚昧而不自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韩国“慰安妇”的遭遇，可以深刻刺激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提醒中国人不然将一样面临“丁男逼向沙场死，少女驱向绝域行”<sup>39)</sup>的惨像。而在塑造日本“慰安妇”形象时，出现了将日本“慰安妇”的遭遇单纯化的倾向，她们形象较为单一，遭遇较为相似，尤其大部分作品都来源于同一个蓝本，可以说其中不乏想象的成分，这使得日本“慰安妇”形象出现脸谱化的特征。毕竟中国作家塑造这类形象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反人类、违反人伦道德的恶劣本质，呼吁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同的创作目的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日本与韩国“慰安妇”形象出现不同的特征。

再次，从整体的国族观来看，中国对日本和韩国有着不同的民族感情与认知。近代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可以说中国对于侵略者日本抱有较强的敌对与反抗意识。这样的国族观念也影响了文学创作，所以中国作家在塑造日本“慰安妇”的形象时，侧重于揭露军阀的恶劣本质，从而起到呼吁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战的目的，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一点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几乎再没有出现对日本“慰安妇”的相关报道及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验证。而相反，我们却注意到二战结束后，仍然出现了与韩国“慰安妇”相关的报道及文学作品，作者们依然对她们投去了同情的视线。同样从整体的国族观来看，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大批韩国人被迫流亡中国，不仅在中国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得到了中国政府与民众的积极支持与支援，当时也有不少韩国志士加入了中国的抗日队伍。可以说，两国基于反帝反殖民的共同课题形成的连带意识，自然影响了作者的创作视角，因而不仅是在抗战当时，战后滞留在中国不能回乡的韩国“慰安妇”依然是中国作家关心与关注的对象。

39) 王季思，《朝鲜少女吟》，出自金柄珉、李存光，同上书第5卷，第90页。



## 4. 结语

综上，本文在深入挖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的作品的的基础上，对不同国籍的“慰安妇”形象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首先，中国作家不仅关注战时受难的中国“慰安妇”女性的遭遇，也关注来自异国日本与韩国的“慰安妇”，这说明当时“慰安妇”存在的普遍性，中国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题材，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世界眼光。其次，中国作家在看待不同国籍的“慰安妇”时投入了不同的视角。在塑造中国女性的形象时，可能基于对本民族和社会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与认知，所以投入了复杂多元的视角，在揭露造成女性受难的民族压迫的同时，也有部分作品触及了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而与日本“慰安妇”相关的文本大部分来自同一个或相似的蓝本，即通过被派往中国战场的日军与其被强征的妻子在慰安所相遇的这一违反人伦道德的故事，凸显日本军阀与财阀的本质，从而起到呼吁日本的被压迫民众反战的作用，所以除谢冰莹的《梅子姑娘》外，大部分作品有着较为定式的思维，塑造的形象较为单一。在塑造韩国同类女性形象时，不仅刻画了受难的韩国“慰安妇”的群像，也有诸如“她”、花子、顺子等各种个性鲜明的个体形象，作者们对这些女性表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揭示她们的遭遇，起到唤醒或警醒中国民众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系列“慰安妇”形象，是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时代与历史背景之下被塑造出来的，在真实再现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对女性造成的压迫与戕害的同时，表达了反日、抗日的民族诉求。这是中国作家们关注这一题材时的基本出发点与立足点，但通过作品分析也可以看出，有些作家不只拘泥于民族主义的框架和立场，还关注“慰安妇”背后隐藏的复杂因素，力图从多个维度阐述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角度为我们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从多个维度全面、准确地解读作品，提供了一定的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们真正把握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意义和当下的价值。



## 〈参考文献〉

资料：

- 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6.18.
- 布德,《第三百零三个》,《杂志》,1938年第2卷第3期.
- 草明,《草明文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 草明,《受辱者》,《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第6卷第6期.
- 大狂,《营妓》,《风光》第9号,1946.5.6.
-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6.
- 冯玉祥,《南京一少女》,《抗战诗史》,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7.
- 虎痴,《营妓》,《万象》第3号,1946.4.30.
- 金柄珉,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
- 冷波,《梅子姑娘》,《黄河(西安)》,1942年第2卷第11/12期.
- 廉岸,《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第八版,1940.4.28.
- 梅兰,《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群众》第1卷第12期,1938.3.5.
- 任重,《南京慰安所里》,《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
- 王芸生,《读〈第三百零三个〉》,《大公报》社评,1938.8.24.
- 武汉师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参考资料》,1977.
-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红色中华》,1934.9.21.
- 《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委会,《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论文及专著：

- 한샤오, 뉴린제, 〈한국인 “위안부” 제재 중국 현대문학 작품에 대한 고찰〉, 《아시아문화연구》 42집, 아시아문화연구소, 2016.
- 李存光, 金宰旭, 《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韩国“慰安妇”形象—舒群、碧野的小说和王季思的叙事诗》, 《当代韩国》 2018年第4期.
- 李杨, 《“右”与“左”的辩证: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年第8期.
- 宋少鹏, 《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 《开放时代》, 2016年第3期.
- 苏智良, 《慰安妇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 吴晓佳,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

- 及〈新的信念〉,《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王學振,《抗戰文學中的慰安婦題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期,2012.12。  
王學振,《“慰安婦”文學:血淚的見證》,《中國社會科學報》第864期,2015.12.11。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Comfort Women”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Han, Xiao

There is a special female imag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that is the “comfort women” image from China, Japan and Korea. This paper firstly mad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comfort women”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n classified them according to nationality, specifically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comfort wome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To be specific, when creating the image of Chinese “comfort women”, Chinese writers not only expose the crimes of the aggressor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ism and then call on the people to fight for the end of the war, but also explore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by gender and patriarchy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In shaping the “comfort women” from Japan, the writers are based mainly on anti-war stance, with the Japanese people apart from the war initiators—the Japanese warlords and plutocrat, accuse the warlord of their press on women in Japan and call for the world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together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When looking at the “comfort women” from Korea, a colony of Japan, they mainly cast a humanitarian view. On the one hand, they expose and strongly condemn the crim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warn the Chinese people to wake up, so as to call for the unity of weak and small ethnic groups. These works project different consciousness and embody different creative purposes. They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document history and expose the evil of

militarism, but also provide us with some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examine this issue toda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comfort women”; gender; nationality; country

이 논문은 2019년 4월 24일에 접수되어 2019년 5월 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9년 5월 14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